

钱锺书《围城》的互文性解读

韩知延*

目录

- 一、文学与学术之间的钱锺书
- 二、《围城》中的互文性
- 三、互文性在《围城》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文学与学术之间的钱锺书¹⁾

钱锺书所涉及的领域广泛、学识渊博，他的多面性，直到今天，还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据杨绛回忆：“他的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以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²⁾ 由于自由多样的读书趣味和习惯，我们之所以如此认识钱锺书区别于他人，他始终抱持一种自然无为而快乐的姿态，也决定了钱锺书独特的思考方式，他的文学观、学术观，乃至人生观和世界观，正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学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课程 ad2039@hanmail.net

1) 至于人名问题，由于汉字简化的缘故，普遍使用“钱钟书”，但名字中的“钟”字的繁体字和简体字仍然混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引用文献时，本文按照个别著作和文章中的人名标记，此外一律使用“钱锺书”，也出于对钱锺书的尊重。

2)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3页。

术研究，就带有“跨”的特点。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写在人生边上》（1941）、《人·兽·鬼》（1946）、《围城》（1947），以及诗作《槐聚诗存》（1995）中，既有学术研究的思想轨迹，又有语言的幽默风趣，文笔精炼而见解深刻，令人回味不已；而钱锺书的学术著作《谈艺录》（1948）、《宋诗选注》（1958）、《管锥编》（1979）、《七缀集》（1985）和札记《石语》（1996）等，古今融合，中西贯通，既有文学创作的自由性，又有学术研究的严谨与从容，富于生动而机智。

读到钱锺书的文章，也如此多样而有力，他在不同的文本形式中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实践：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的钱锺书，他的散文随笔和读书札记，在文笔上自然有厚重的地方，但使这些古已有之的文体，引发读者的深思和会心的一笑；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钱锺书，在小说创作上，以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和人性等诸多问题，构成了显著的文学语言特点及比喻艺术的独特风格，留给人们深思的严肃问题；他的学术著作，采用的则是连珠式的文体和笔记体的古代文体，其文洒脱，趣味隽永，忠实于古代文人的行文实践，继承了文人传统，实现了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治学方法。我们可以据此判断，钱锺书的文体意识是自觉的、多方面的。可见，他在不同的文体意识中当过小说家、散文家和学者的不同角色，作为文人的气质和想象力，以及作为学者的风度和渊博学识二者的结合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钱锺书及他的文章时，以上之前提不能被忽略。³⁾ 虽然两者之间存有区别，但可

3) 评论家柯灵认为：“锺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汨汨地流泻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戏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嘻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锺书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今古，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戛戛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只有理知和感情的高度溶合，高度升华，高度平衡，才能达到这种难以企及的境界。”以上内容参见柯灵：《钱锺书的风格与魅力——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读书》第1期，1983年，第24、27页。

以发现钱锺书仍然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思想性格和人生态度，也可以发现其创作方法与阐释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

正如他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所说的一样：“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⁴⁾可见，钱锺书的著作具有跨学科和学术领域之特征。对此，已充分得到当今中国学术界的认同。

除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之外，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学科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显著的多元性和广泛的学科性，也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但在笔者看来，至于韩国学术界对于钱锺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的文学作品，涉及学术论著等其它文章研究是尚未全面展开的，从平面的角度去了解钱锺书。尤其在以往的研究中，将《围城》放在现代文学史的语境中，以文本艺术的本体意义和独特形式为主要研究焦点来进行讨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解释钱锺书其人其文所具有的“立体性”。因此，我们通过重读钱锺书的文本，要进一步把握在面对文学和学术的两者联系的问题上，在小说创作方面作者如何运用学术的元素，如何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思维，以及他如何在不同领域之间试图沟通。

基于这一点，本文以这些研究意识来解读钱锺书，立足于文人身份的钱锺书，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切入口。因此，本文将他的小说《围城》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狭义的互文性来试图探讨从文学和学术的不同领域中所谓“互文性”特点如何体现在他的文本中，以及如何展现独具一格的思维轨迹。在互文性视角下，《围城》之所以给我们提供诸多解读的可能性及线索，是因为他的小说充分地体现所谓文学的灵活性与学术的原则性之间的张力。据此本文认为，这即是《围城》的文本价值之所在。

4) 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

二、《围城》中的互文性

以往研究表明，钱锺书的全部著作有着强烈的“互文性”。一方面钱锺书认为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上，文史哲各科彼此系连，自由组合，从而构成一种宏阔的中西文化阐释背景，而这种宏阔的文化背景与每一种文化现象相映发，凸显出中西共同的文心、诗心；另一方面钱锺书著作体现出明显的内在联系与强烈的“互文特征”。《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三者在写作时间上若相吻合，基本涵盖了钱锺书的学术生涯，除时间上的吻合之外，三者都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和文论体系之间的文本指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构成了所谓有趣的“阐释的循环”⁵⁾意识。此外，甚至小说创作与文艺批评亦具有深刻的“互文性”，在作者的小说创作中点缀着精妙的学问，在他的学术批评中又处处可见小说家的手眼。⁶⁾ 与此相关，钱锺书曾说：“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碎，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皆不浅。作者玩古人之

5) 为了更进一步理解，不妨参考相关论述。钱锺书的“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特别是其文学阐释思想的核心观念。他的“阐释循环”论有如下三个要点。其一，钱锺书“阐释循环”的提法，固然是借鉴了西方阐释学，但就其实质内容却是同时融合了中西阐释思想的相关说法。其二，理解与阐释要做到“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就必须是一个在“小”与“大”、“末”与“本”之间亦即局部与整体之间进行“交互往复”的循环阐释过程。其三，上述多层次的循环都还只是指“阐释循环”的范围，对“事理”、“心理”及“文理”的把握才是其目的。由于钱锺书一直就在“古今”之间、多个“学科”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互阐释”并致力于“解会赏析之道”的探讨。为了“互相照明”、“交互阐发”，在中外“同心之言”所共同构成的整体语境之中对“阐释循环”论进行“阐释循环”，从而会通众说自成一家。根据这一点，钱锺书文本中所谓“阐释的循环”之特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正如钱锺书所说的“阐发共味交攻(synergism)，最为明通”一样，以周览圆照将阐释之循环推向极至，即意味着文本与阐释者互相阐发的过程。可以说，钱锺书对人性和人生的理性思索痕迹隐含在《围城》文本背后，既体现出精妙的构思，又阐发出以哲理为中心的文体意识，换句话说，从思索、构思至阐发构成独具一格的阐释空间。由此可以判断，文本互文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永远产生出不同的阐释的余地。本文认为准确把握这些前提，有助于进入《围城》从文学和学术的不同领域中“互文性”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参见李清良：《钱锺书“阐释循环”论辨析》，《文学评论》第2期，2007年，第43-49页。

6) 相关论述参见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85页。

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会心不远，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⁷⁾可见，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论批评，钱锺书通过追溯的方式来探索其渊源和相互影响，从中深刻体会到文本的真正含义，这意味着他十分重视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现象。

钱锺书以文人的趣味和文化信念、知识分子的敏锐眼光和洞察力来对当时的客观现实进行细致分析和特殊观照，就这一点而言，《围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然《围城》作为一部具有学术面貌的文本，值得探讨的是，钱锺书在《围城》中所体现的“互文性”特征。正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拓展思路，本文认为，有助于对《围城》的互文性解读的认识和理解。根据其概念，互文性意味着文本形式的呼唤意味着话语形式的变化。文学的各种文类都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同时也相互阐发，它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它还包括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⁸⁾显然，这与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互文”（即“参互成文，含而见文”）概念截然不同，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但本文关注的是其“互补互渗”之特点和“前后演化”的内在联系性，从这一点来讲，本文认为可以谨慎地把它运用到《围城》文本解读的层面上。

7) 钱锺书：《小说识小续》，《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51页。*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失原始资料，本文所参考的是2002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版本。根据其版本，此文章原载在《联合晚报》1946年4月17日，5月2、9、23日，6月7、21日。

8) 在此需要回顾与思考的是关于互文性 (intertextualité) 理论的具体定义。克里斯特瓦 (Julia Kristeva) 借鉴巴赫金 (M.M. Bakhtin) 的对话主义，提出“互文性”概念，并阐释和概括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至于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热情宣传和积极阐释其概念，由此形成和巩固西方文论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从广义的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 (文本) 的互动作用 (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所谓狭义的互文性，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明引、暗引、拼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影射、重写等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关系。参见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2004年，第19-30页；另参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8-94.

从互文性视角的理论层面看,对《围城》文体的理解,其文本背后有着不少饶有文体趣味的思想含义,作出了富有启示性和贯穿性意义的阐释,并构建了具独特及灵活的“互文性”空间。正如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言:“常套的延伸,源起的颠倒,先前的文从后来的文中逸出来的从容不拘。”⁹⁾基于这一认识,从互文性解读的层面上,可以说有其相通之处的。

据此可以判断,《围城》的文本意义,在于钱锺书在小说创作上多元性实践,还在于它在交互指涉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化话语问题的思索,使小说文本成为具有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呈现作者的内在自觉的文体意识。因此,本文以《围城》中出现的不同表现形式中,将“比喻”和“典故”的两种具有狭义性质的写作体系切入,认为试图可以探讨《围城》的互文性。

1、“比喻”中的互文性:本喻体之互动,间接的互文性

所谓比喻,它不只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因为比喻的产生与人们的感知、想象和思维特点息息相关。借助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说法,“显喻和意象譬与隐喻一样,表现出想象力的大胆,想象力在碰见一种对象时,在这就这种对象进行工作之中,显示出一种能力,能把外表上相隔很远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摄取最丰富多采的东西来为这独一的内容服务,并且通过心灵的工作,把一个五光十色的现象世界联系到既定的题材上去,这种塑造形象,通过巧妙的联系和配合把一些不伦不类地东西联结在一起的能力就是一般的想象力,它也就是显喻的根由。”¹⁰⁾不难发现,比喻既表现“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形式上把

9) I savor the sway of formulas, the reversal of origins, the ease which brings the anterior text out of the subsequent one. See Roland Barthes; Richard Miller; Richard Howard,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p.36. 中译本见[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文际关系(Inter-texte)》,《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10) 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

两者连接起来构成体系。即从本体到喻体的联想，从喻体到本体的联想，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鲜明的前后互补性质，通过两者的互动中不断产生其联想意义。

钱锺书文章的精妙之处，正是内在于他的“比喻”体系在文体中的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志清对《围城》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也已充分表明钱锺书是非常优秀的文体家，他对细节的表现，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认为钱锺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也称之为显喻，*similes*）”的高手，善用象征事物，在选择细节时不单为适合情节内容，通过细节间接的去评论整个剧情的道德面。¹¹⁾ 基于在这样的理解下，本文认为《围城》往往采用“比喻”，以达到作者所暗示的目的，这可称之为“间接的互文性”。而在《围城》的比喻特点中本体和喻体之互动关系的层面也体现得尤为鲜明。

首先要关注的是，从《围城》的比喻形式来看，钱锺书一般使用的是明喻，在文本中屡次出现。即用“如、像、好比、好像、就像、仿佛、如同、好比、宛如、譬如、和……一样、……似的”等典型的比喻词来把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两种不同事物连接起来，把本体和喻体一体化，并且使用这些比喻词时也遵循明喻的基本类型和结构特征的规律，试举《围城》中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一下。如“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Giotto）画得‘O’一样

136页；另参[日]加藤尚武、久保阳一、幸津国生、高山守、泷口清荣、山口诚一主编，[韩]李信哲译：《黑格尔辞典》，首尔：图书出版b，2009年，第169-170页。

11) 参见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以下是英文原文：Ch'ien Chung-shu is a stylist of unusual distin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we do not have the epigrams and puns which invariably enliven his comic passages, but we have a specimen of his perspicuous and elegant prose, which its attentiveness to concrete detail and its carefully wrought imagery. Especially is the author a master of similes: several from the selection could be cited for their aptness and precision. Ch'ien Chung-shu is also a symbolist, as is every novelist who is not content to choose his details merely for their dramatic propriety but makes them comment obliquely on the total action. C.T.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459-460.

圆。”¹²⁾这段话是用意大利著名画家吉沃吐(Giotto di Bondone)技艺精湛的绘画中画出的“O”来比喻孙柔嘉惊奇的眼睛。一方面,这是最典型的比喻结构,其形象十分具体。另一方面,作者虽然采用了明喻的典型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吉沃吐的绘画特点来看,作者的比喻貌似与绘画法理论中的透视法相似,使客观物象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从而构成了视觉方面的“互文”特点。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法国也有这末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¹³⁾

这是《围城》中脍炙人口的一段话,其比喻得淋漓透彻。钱锺书将婚姻和人生(本体)分别比作“金漆的鸟笼”和“被围困的城堡”(喻体)。通过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作者根据对婚姻和人生的抽象性认识,以鸟笼和城堡为代表的两种相似性的具体形象,阐发着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悲悯情怀和文化思索,也悟出了所谓在人生中无法弥补的孤独感,并且引申出具有悲剧意蕴¹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二、所谓“鸟笼”和“被围困的城堡”是指客观

12)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192页。

13)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127、187页。

14) 据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Durant, W.)的著作《哲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中,论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悲剧理论的哲学体系。在叔本华哲学体系中,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的人的本质,即所谓“意志”的活动。认为“婚姻是爱情的消减,势必归于幻灭。”“如果世界是意志,那么它必定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人生就是战争。在自然界中,到处可以看到斗争、角逐、冲突和胜利的毁灭性交替。”“我们结婚不幸福,不结婚也不幸福。独居不幸福,群处也不幸福;我们像一群聚在一起取暖的刺猬,挤得太近了不舒服,然而分开了又可怜。这全是滑稽可笑的。”钱锺书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影响颇深,也对叔本华哲学是深有研究和体会的,因此在《围城》中所描述的人生万象中有诸多与叔本华所阐释的哲学思想极其吻合之处,有一定的内蕴。本文认为,从互文性理论把外在的影响文本化的这一点看,同时也有助于对《围城》的“互文性”问题进一步探讨。参见[美]杜兰特(Durant,

物象，在《围城》中，这些客观物象经过作者的独特的思考和视角，也融入了作者主观情绪，重新创造出人生意象的内涵。由此可以判断，在这段话中的本体和喻体构成阐释和被阐释的关系，其比喻所引伸出的象征意义体现出明显的互文迹象，从而将《围城》的整体含义“点”醒了。¹⁵⁾

其次是从不同角度来把几个喻体反复设喻说明一个本体，即所谓的“博喻”。对此，钱锺书曾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谈过关于博喻的特色¹⁶⁾，认为博喻是丰富多彩的比喻，生动而贴切，含义深长。

苏小姐胜利地微笑，低声说：“Embrasse-moi！”说着一壁害羞，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令鸿渐吻自己。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¹⁷⁾

当作者描述一场难以避免的情景时，联想到一些不同的喻体：“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和“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这些多种喻体在比喻的实际运用上都各尽其职，其富有机智的风趣由此而产生，也使本体意义更加强化。

第三是从联想的意义来看比喻，这可称之为“类似联想”¹⁸⁾。在《谈艺录》

W.) 著，金发乐等译：《哲学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3、98、101-102、104页。

15) 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1989年，第162页。

16)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论及博喻的问题。如《诸法释论》第十二举十喻、《维摩所说经·方便品》第二言、唐译《华严经·十地品》第二十六之四先后两次举八喻、《金刚经》之“六如”、基督教诗言人生脆促，举十多喻、古希腊大诗人平达喻人生等，即以几种东西作比的，钱锺书谓之博喻，是一连运用多种比喻。相关内容参见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05-306、615-616、648页。

17)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136-137页。

中有相关论述：“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祇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擬。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¹⁹⁾ 对此，试举《围城》中的具体例子来讨论一下。

“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²⁰⁾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樁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会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²¹⁾

从这两段话中，第一段话的喻体是两根树枝和蜘蛛网，而本体是两个人。作者从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对象中，以联想的方式来找到了类似点。而在形容留学的第二段话中，本体和喻体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任何人都想出国（任何人都出痘子），非出不可（非出不可），出国回来后会有了抵抗力（出过痘子后就有了抵抗力），遇到博士硕士不再畏怯（遇到类似毛病不再害怕）。出过国的算是了了心愿（出过了水痘不留痕迹最好），挂在嘴边令人生厌（挂在脸上变成麻子令人生厌）”。

作者通过两种毫无相关的物象来进行对应和联想，呈现出贴切而相似的比喻效果，并且产生出联想式的引申意义，本体和喻体之间也形成一定的结构，以达到作者所要表达的目的。由此可以判断，这可称之为“间接的互文性”。

18) 参见陈子谦：《钱学论》（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1-462页。

19)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页。

20)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353页。

21)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106页。

钱锺书文章的精妙之处如前所述，正是内在于他的“比喻”体系在文体中的作用。在文学创作领域上，比喻是“化虚为实”的重要修辞手法之一。因为比喻具有形象具体化的特征，有特定的形象，就有特定的情境、意境、画面或境界，虚的变成了实的，死的变成了活的。思想、情感、心态，往往不可捉摸，是抽象的，只有用语言文字将它具象化：物化、情境化或画面具体化，才可见可触，可赏可鉴。²²⁾

正是根据这样的艺术特点，我们试图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去探讨文本。借助钱锺书的说法：“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赞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从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看来，移情作用跟泛客观（Pan-objectivism），行为主义跟唯心论，祇是一个波浪的起伏，一个原则的变化。”²³⁾“均就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²⁴⁾由此可以看出，比喻所诱发的是“想象”和“联想”，可以说这是互文性表现之一，比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鲜明的前后互补性质，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中所产生的新意。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从中探讨关于“比喻体系”和“互文性”之间的联系。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来看，前者即通过比喻，让本喻体在文本中相互说明、相互比照、相互衔接，起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构成互喻，从而组成一个文本本身内在（intertextual）的互文性。后者是钱锺书由文学家的艺术才气和学者的学识修养，两者的相结合，融入到具体文本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本互动，也具有理论上的探索意义。

据此可以探讨《围城》的运用比喻表现中所出现的互文性。在互文性视角下，使我们可以把文本放在其他层面进行思考，也使文本增添一个新的特征。

22) 陈子谦：《钱学论》（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3页。

23) 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8月。（第16页）

24)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页。

《围城》中的比喻体系通过自身的内外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构筑特定意义。本文认为，这意味着他在比喻体系方面把“文学创作”和“学术理论”相结合的一种自觉意识。

2、“典故”中的互文性：打通古今，会通中外

钱锺书在《围城》中运用了众多典故，典故的来源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其他文化方面的知识²⁵⁾，正如钱锺书所说的一样，“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瓢自运之助”。²⁶⁾ 对此，可以从宏观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钱锺书广而深厚的文化意识。他在《谈艺录·序》中写道：“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²⁷⁾ 这种“打通古今”、“会通中外”的文化积累和思考，直接投影到《围城》的“典故”之运用。可以说，这既是极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又是贯穿于文本内部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是理论意义上的考察。在互文性理论的视角下，目前所用的互文性这一术语把文学模仿和典故视为任何不同文本之间相互关联的多种方式之一。²⁸⁾

25) 值得参考的是，《围城》的运典隶事，它属于“类比推理”，即所谓“古事比”。它可分为两类，是“明理征义”和“断章取义”。两类用典，或“明”或“暗”，或简或繁。其“推理”都为“比譬”，有“对比”、也有“类推”。超乎这两类的是“化典造境”。因此可以说，《围城》中的用典，提高到作者创造性思维的高度。参见《“钟嵘症”与“钱钟书征候”——论〈围城〉的运典隶事》。此文章收录于陆文虎编：《钱钟书研究采辑（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88-189页。

26)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6页。

27) 钱锺书：《谈艺录·序》（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8) The current term *intertextuality* includes literary echoes and allusions as one of the many ways in which any text is interlinked with other texts. See M.H.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Thomson Learning, 1999, p.9-10. 中译文见[美]艾布拉姆斯(Abrams, M.H.)著，吴松江译者：《文学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因此，文本中的具体互文性现象往往在作者所引用和改写的典故来表现出来，并对此加以论述，对文本起到生动而贴近的实际作用。

(1)《围城》中的文学典故：饶有兴味的诗意，别有风趣的境界

典故是钱锺书文学创作的重要实践之一，也是钱锺书文章的精妙之处，《围城》以古诗文为重要典故，造出具有审美性质的情境。²⁹⁾对此，试举具体例子来讨论一下。

壁上挂的字画里有沈子培所写屏条，录的黄山谷诗，第一句道：“花气薰人欲破禅。”鸿渐看了，会心不远，觉得和尚们闻到窗外这种花香，确已犯戒，与吃荤相去无几了。³⁰⁾

在这段落中引用到黄山谷（黄庭坚）的小诗“花气薰人帖”，原诗为“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从《围城》中的具体语境来看，作者略带嘲讽地看着方鸿渐，自然而然地运用了典故。宋吴沆《环溪诗话》卷中谓：“山谷诗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于诗为新巧，于理未为大

社，2009年版，第19-20页。

29) 关于这一点，不妨参考相关论述。黑格尔在《美学》中阐述了文艺创作中的情境问题。即“艺术所要描绘的就不仅是一种一般的世界情况，而是要从无定性的普泛观念进到描绘有定性的环境和情况。情境就是特殊的前提，使本来在普遍世界情况中还未发展的东西得到真正的自我外现和表现。情景一方面是总的世界情况经过特殊化而具有定性，另一方面它既具有这种定性，就是一种推动力，使艺术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容得到有定性的外现。特别是从后一个观点看来，情境供给我们以广阔的研究范围，因为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在这方面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要求。”从这一点讲，我们从《围城》中的典故中可以发现，作者通过人物的独白和对话的表现形式，以及特定的语境中运用典故，造出所谓具有审美性质的情境话语。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2-254页；另参[日]加藤尚武、久保阳一、幸津国生、高山守、泷口清荣、山口诚一主编，[韩]李信哲译：《黑格尔辞典》，首尔：图书出版b，2009年，第188-189页。

30)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62页。

害。”³¹⁾ 既变现了学识积累的厚度, 又包含了典故中更生新意, 带着禅的意味, 由此写出了含蓄的点睛之笔。

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 叫‘陵谷山原’。三陵: 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 二谷: 李昌谷、黄山谷; 四山: 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 可是只有一原, 陈散原。”³²⁾

苏小姐道:“我没见过董太太, 可是我想像得出董太太的美。董先生的诗:‘好赋归来看妇孺’, 活画出董太太的可爱的笑容, 两个深酒涡。”(中略)

斜川生气不好发作, 板着脸说:“跟你们这种不通的人, 根本不必谈诗。我这一联是用的两个典, 上句梅圣俞, 下句杨大眼, 你们不知道出处, 就不要穿凿附会。”³³⁾

董斜川说旧体诗, 极有解颐妙语。“三陵”为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梅宛陵(梅尧臣);“二谷”为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为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还有陈散原(陈三立)。据研究者多方考证, 董斜川的原型是钱锺书的好友冒效鲁。³⁴⁾ 至于这一段话,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不过是钱锺书的雅谑。因为所谓“三陵”、“四山”, 亦有来历。所谓的“三陵”之说, 始发于胡汉民, 见其《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而张佩纶《涧于日记》云:“《随园诗话》载王楼村先生诗学‘三山’, 谓香山(白居易)、义山、遗山也。晦若(于式枚)因之改香山为虞山(钱谦益)。余皆不以为是。余亦有‘三山’, 则义山(李商隐)、半山、眉山(苏轼)耳。香山与义山太不类, 遗山亦不足学, 由半山以溯昌黎(韩愈), 由眉山以规李杜, 此学诗之津梁, 通唐宋

31)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版, 第344页。

32) 钱锺书:《围城》,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1947年, 第129页。

33) 钱锺书:《围城》,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1947年, 第131页。

34) 详细内容可参见李洪岩著:《钱锺书与近代学人》,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年, 第96-100页。

之界，而上无晚唐波靡之音，下断西江粗直之派，则亦诗之中流也。”张佩纶所说“三山”，虽本诸袁枚《随园诗话》（见卷九），但具体之人颇有变更，这自是其诗学不同所致。“近人张篔簹好荊公，至以半山配义山、眉山为三山，其《润于日记》光绪壬辰四月十一日自言在塞上，以雁湖注甚略，颇求宋人稗说补之。”³⁵⁾ 这当可为《围城》之笺。³⁶⁾ 另外，董斜川自己写的诗句“好赋归来看妇孺，大惭名字止儿啼”，上句用的是梅尧臣的《初冬夜坐忆桐城山行》，曰：“吾妻尝有言：艰难壮时业；安慕终日闲，笑媚看妇孺。”³⁷⁾ 下句用的是杨大眼的典故，典出《魏书·杨大眼传》：“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通过这些典故，使董斜川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思想性格更加突出，在理解典故的董斜川和不理解典故的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褚慎明等那些人之间，也造出诙谐逗趣的情节和情景。

苏小姐目送他走了，还坐在亭子里。心里只是快活，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想着两句话：“天上月圆，人间月半，”不知是旧句，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今天是四月半，到八月半不知怎样。“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又记起曹元朗的诗，不禁一阵厌恶。听见女用人回来了，便站起来，本能地掏手帕在嘴上抹了抹，彷彿接吻会留下痕迹的。觉得剩余的今夜只像海水浴的跳板，自己站在板的极端，会一跳冲进明天的快乐里，又兴奋、又战栗。³⁸⁾

所谓“天上月圆，人间月半”，见于《五灯会元》卷十六法因禅师云：“天上月圆，人间月半”；吾乡邹程村祇谟《丽农词》卷下《水调歌头·中秋》则云：“刚道人间月半，天上月团圆”；死灰槁木人语，可成绝妙好词。³⁹⁾ 又见于《夷坚志》支庚卷八《江涓遇二仙》则中一侍女曰：“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教人似月，正在今宵。”董文友以宁《蓉渡词》卷下《满江红·乙巳元夕述哀》：“月

35)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页。

36) 参见王培军：《钱钟书小说里的几个典故》，《书屋》第11期，2007年，第54页。

37)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8页。

38)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137-138页。

39)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6页。

正团员，却不道今宵月半。”端木鹤田国瑚《大鹤山人诗集》卷一《月谣》：“天上一月，地上一月。天上月圆，地上月缺。”⁴⁰⁾即使是旧句，但却激发了作者敏锐的灵感，淋漓尽致地散发出潇洒灵动的诗意。⁴¹⁾此外，以月亮的意象中烘托出苏文纨的心思，也暗示着她的爱情悲剧。据此可以判断，这些典故在《围城》的特殊语境中营造出令人别有风趣的情景，也产生出新的形态和意义。其典故和人物的心理描写融为一体，给人留下回味无穷的余地。

(2) 《围城》中的中外典故：含蓄精炼的笔法，耐人寻索的内涵

除文学典故之外，钱锺书还用了不少具有文化内涵的中外典故。需要指出的是，这不只是知识的罗列，这正是根植于作者对古今中外文化有着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因此也可以作为创作上的理论论据。这种典故之运用，既给小说文本增添了一笔极其绝妙的“讽刺”和“思想”意味，也增加了一定的“哲理性”和“学术性”。作者通过以含蓄精炼的笔法，透彻出一种耐人寻索的深刻内涵。对此，试举《围城》中的具体例子来讨论一下。

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个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⁴²⁾

40)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6页。

41) 关于诗意的话题，可参考钱锺书在《谈艺录》中的论述角度：“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成文须如是，为言须如彼，方有文外远神、言表悠韵，斯神斯韵，端赖其文其言。品诗而忘言，欲遗弃迹象以求神，遏密声音以得韵，则犹飞翔而先剪翮，踊跃而不践地，视握苗助长、凿趾益高，更谬悠矣。瓦勒利尝谓叙事说理之文以达意为究竟义，词之与意，离而不著，意苟可达，不拘何词，意之既达，词亦随除；诗大不然，其词一成莫变，长保无失。是以玩味一诗言外之致，非流连吟赏此诗之言不可；苟非其言，即无斯致。”他认为诗意和诗韵，就保存在诗的词语里，只有吟赏诗的词语，才能体会它的言外之音和神韵。参见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2-413页；另参周振甫，冀勤编著：《钱锺书〈谈艺录〉读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6-17页。

42)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2页。

在《围城》的开头中，作者借用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话，描述了在开往中国的法国游船上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的法国警察围着犹太女性在调情的场景。显然，对那些法国人充满了讽刺和针对的意义。讽刺中寄予着幽默，针对中体现着法国人的文化根源，即意味着法国人对文化方面的观念依旧保守，由此强调法国人拥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绪。

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⁴³⁾

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亚刺伯诗人所描摹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跟爱人在使性子。（中略）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运气好的人养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A homem ventureiro a filha lhe nasce primeiro）；因为女孩子长大，可以打杂，看护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用人的工钱。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⁴⁴⁾

两段话分别讽刺了方鸿渐和鲍小姐。当方鸿渐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柏拉图（Plato）《理想国》中的一句话和孔孟两位圣人的事例来形容方鸿渐自我解嘲和自欺欺人的心理；当作者描述鲍小姐时，则引用《天方夜谭》中的一句话和葡萄牙的谚语来嘲讽鲍小姐的“聪明伶俐”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点。作者独有的讽刺和批判之笔触由此而增强，其讽刺的背后产生着生动而逼真的显著性意义。

他在大学校长里，还是前途无量的人。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

43)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14页。

44)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17页。

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⁴⁵⁾

三间大学校长高松年是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但仕途失意，碰壁下野沦落为校长。有趣的是，钱锺书显然“反用”其典，即从《论语·子张》中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文变为“仕而不优则学”，仍是充满着钱锺书式的嘲弄，露出几分讥诮嘲讽之意，突出文本意义的流动性。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围城》的讽刺性体现在灵活而生动的古今中外典故之中。除讽刺意味之外，在《围城》中，运用类似典故来还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文化内涵，试举如下几段话：

“各位都知道欧洲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是在明朝中叶。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合时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中略）“这个‘洋’当然指‘三保太监下西洋’的‘西洋’而说，因为据《大明会典》，鸦片是暹罗和爪哇的进贡品。可是在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十年归（Odyssey）里——”（中略）“叔本华早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是杨梅疮。诸位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极容易的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德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⁴⁶⁾

作者通过重新审视处在特定时期中知识阶层的文化心态，引发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换言之，这正是钱锺书立足中国现代化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化文明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关照的，它所反映和揭示的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者在作品中进一步把思想批判意向和审美观照方向指向了整个人类存在，从而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和现代意识的

45)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258-259页。

46) 钱锺书：《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48-49页。

高度上又一次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的问题。⁴⁷⁾ 这意味着从对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过程中, 呼吁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的文化觉醒。

此外, 《围城》里有一段关于人如何吃葡萄的妙解。方鸿渐在孙柔嘉订婚
后, 他想起国外留学上道德哲学课时一位老师讲过的话。

“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 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 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 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 第二种人应该悲观, 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 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 第一种人只有回忆。”⁴⁸⁾

钱锺书曾在《写在人生边上》中论及过《伊索寓言》: “狐狸看见藤上一颗颗已熟的葡萄, 用尽方法, 弄不到嘴只好放弃, 安慰自己说: ‘这葡萄也许还是酸的, 不吃也罢!’ 就是吃到了, 他还要说: ‘这葡萄果然是酸的。’ 假如他是一只不易满足的狐狸, 这句话他对自己说, 因为现实终‘不够理想’。假如他是一只很感满意的狐狸, 这句话他对旁人讲, 因为诉苦经可以免得旁人来分甜头。”⁴⁹⁾ 作者由《伊索寓言》所引起的感想, 在《围城》的一段话中隐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指的是以不同的心态和应对方式, 产生不同的结局, 阐述了对人生诸事的复杂心态和态度。

本文在互文性的视角下, 以互文性的范畴中重要一环的“典故”为例, 探讨了《围城》文本中的互文性。他在《围城》中所采取的典故, 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其背后有着钱锺书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教养、机敏和睿智的个人气质, 以及独具一格的文化思考。钱锺书曾论及用典的作用和其意义, 他从钟嵘的“吟

47) 参见解志熙: 《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 《文学评论》第5期, 1989年, 第75页。

48) 钱锺书: 《围城》, 上海: 晨光出版公司, 1947年, 第377页。

49) 钱锺书: 《读伊索寓言》, 《写在人生边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第47页。*注: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缺失原始文本(是指1941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 本文所参考的版本是1990年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版本。

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知识考察后，对于运用典故提出自己的看法，即“词头，套语，或典故，无论它们本身是如何陈腐丑恶，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的性质跟一切譬喻和象征相同，都是根据着类比推理（Analogy）来的，尤其是典故，所谓‘古事比’。假使我们从原则上反对用代词，推而广之，我们须把大半的文学作品，不，甚至把有人认为全部的文学作品一笔勾销了。”⁵⁰⁾ 另还提出“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⁵¹⁾ 这即是钱锺书在谈文学作品时为何注重用典的实际缘故，以及讲究用典技巧，对用典的“正面意义”⁵²⁾表示十分肯定。

在《围城》中，作者通过古今中外的诸多典故，营造出饶有兴味的诗意和耐人寻索的深刻内涵，从中提炼出一个具有深刻见解、值得思考和借鉴的观点。这与文本内部中的新语境融为一体，构成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从而得到创作实践中的“互文性”特点。对此，可以借助相关论述进一步探讨，照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说法，任何文本都是超文本（也称之为跨文本）的。因为使用引文，所以“被引用的文本”（是指“典故”）之间的互异性清晰可见：引用总是体现了作者及其所读书籍的关系。也体现了插入引用后所产生的双重表述。引用汇集了阅读和写作两种活动于一体，从而流露出了文本的写作背景，或者说是为完成该文所需的准备工作、读书笔记以及储备的知识。由此所谓的“引文”（是指“典故”）变成了文本的嫁接，而且能够“嫁接成活”，也就是说，嫁接

50) 中书君：《论不隔》，《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7月。（第78-79页）

51)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4页。

52)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典故的正反面显得明显。其两面意义如下：1、作为艺术符号的典故，乃是一个个具有哲理或美感内涵的故事的凝聚形态，它被人们反复使用、加工、转述，而在这种使用、加工、转述过程中，它又融摄与积淀了新的意蕴，因此它是一些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符号。2、这些符号，正因为它有古老的故事及流传过程中积累的新的意义，所以十分复杂晦涩，枕好象裹了一不溶于任何液体的外壳的药丸子，药再好，效果也等子零。因此它是一种没有艺术感染力的符号。参见葛兆光：《论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特殊意象的分析》，《文学评论》第5期，1989年，第20页。

过来的文本在新的环境中生了根，并与新文本形成有机的联系。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众例并举的百科式的原始资料，而是一套有机的素材，其中产生的联系既与原始材料相关，亦与承接的全局相容。被引用的片断与原文保持着联系，但这一片断不会毫发无损地被插入新的环境中，因为片断本身和承接它的新文本都会因此发生不可忽视的变化。⁵³⁾从这一点看，本文认为典故在《围城》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创作上的“互文性”理论论据。

通过上述论述，典故对《围城》的文本互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本本身内部和以多种形式的典故为例的文本之间存在着广泛而错综复杂的互文性关系，从而构成了文学和学术之间的对话系统。

三、互文性在《围城》中的作用和意义

钱锺书在文学和学术的不同领域中，将他的个性和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小说家、散文家和学者角色的互相转换过程中，体现出多方面的文体意识。基于文学和学术的两者联系和互动问题上，他在小说创作方面运用不少学术的元素，对它自觉地进行思维，试图相互沟通。

据以上前提，本篇文章通过重读《围城》，寻找线索和提出若干思考。论述的重点为从文学和学术的不同领域中所谓“互文性”特点，将它分为“比喻中的互文性”和“典故中的互文性”的两个切入点，浅谈了互文性特点如何体现在《围城》中，以及如何展现作者独具一格的思维轨迹。

本篇文章的正文第一部分，首先重新了解所谓比喻的特点和其价值。通过从本体和喻体之间所构成的体系、从本体到喻体之间的联想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前后互动性质。《围城》往往采用比喻，以达到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目的。因此，本文认为，这可称之为“间接的互文性”。基于这一点，本文关

53) 参见[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131页。

注了《围城》的“比喻”中的互文性，将它分为“明喻”、“博喻”和“类似联想”的三个部分来进行讨论。在《围城》中，所谓明喻和博喻，它虽然在类型和结构方面上具有比喻本身的典型特点，但文本中的本体和喻体之间构成阐释和被阐释的关系，其比喻所引伸出的含义及其象征意义体现了互文现象；所谓类似联想，作者通过两种毫无相关的物象来进行对应和联想，呈现出比喻的立体效果，使本体和喻体更加贴切，比喻特点也更加突出，并且产生出联想式的引申意义。此外，本体和喻体之间也形成一定的结构，是互相渗透、相互作用的，从而达到作者所要表达的目的。虽然其间接性因素在内，但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在”的“互文性”特点。

正文第二部分，本文主要论述了“典故”中的互文性，将它分别以“文学典故”和“中外典故”来进行讨论。钱锺书在《围城》中用了诸多典故。以古诗文为重要文学典故，以及具有文化内涵的典故，作为创作上的理论论据，这正是根植于作者对古今中外文化有着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可以说，这是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基本类型的典故，但在《围城》中显得与众不同。经过作者的精心构思和改写，营造出相似的诗意和别有风趣的境界。通过运用典故，既给小说文本增添了一笔极其绝妙的讽刺和思想意味，也增加了一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哲理性和学术性，透彻出一种耐人寻索的深刻内涵，升华为饶有风趣的典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认为《围城》由典故入手，组成了文本“互文”意义的“对话系统”。

互文性不仅在文学创作与鉴赏中常见，也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或流动性。作为一个话语空间，它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也充分表明文学作品所依赖的特殊艺术手法与阐释功能。互文性理论更加突出地强调文本内容之间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极大地解放了以往文学研究的视野，可以说这是互文性理论最具特色和最富贡献的一面。本文虽然从狭义的互文性来重读《围城》，但本文认为《围城》之所以给我们提供诸多解读的可能性及线索，是因为他在小说中的比喻和典故充分地体现所谓文学的灵活性与学术的原则性之间的张力，在比喻和典故的外

在写作方式和作者的内在精神相互运作中，清晰地体现出明显的互文性。

钱锺书通过“求同存异”的写作策略来追寻文本的阐释空间中的深层意蕴，自然而然地打破传统文体分类及文学和学术领域的二者的界限。钱锺书对人性和人生的理性思索痕迹隐含在《围城》文本背后，通过“比喻”和“典故”的写作体系，从作者的思索、构思至阐发构成别具一格的学术特性及其意义。

参考文献

1、基本文献

《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1934年。

《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1937年。

钱锺书:《围城》,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1947年。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版。

钱锺书:《七缀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2、研究文献

周振甫, 冀勤编著:《钱锺书〈谈艺录〉读本》,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

陈子谦:《钱学论》(修订版),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4年。

陆文虎编:《钱锺书研究辑(一)》,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年。

陆文虎编:《钱锺书研究辑(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

李洪岩著:《钱锺书与近代学人》,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年。

冯之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

冯之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

冯之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

许龙:《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高万云著:《钱锺书修辞学思想演绎》,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

杨联芬编:《钱锺书评说七十年》,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

3、相关文献

-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美]杜兰特(Durant, W.)著,金发乐等译:《哲学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 C.T.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Roland Barthes; Richard Miller; Richard Howard,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4、学术论文

- 柯灵:《钱锺书的风格与魅力——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读书》第1期,1983年。
- 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1989年。
- 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第5期,1989年。
- 葛兆光:《论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特殊意象的分析》,《文学评论》第5期,1989年。
- 季进:《论钱锺书著作的话语空间》,《文学评论》第2期,2000年。
-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2004年。

卞孝萱：《钱钟书冒效鲁诗案——兼论〈围城〉人物董斜川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2006年。

王培军：《钱钟书小说里的几个故典》，《书屋》第11期，2007年。

李清良：《钱钟书“阐释循环”论辨析》，《文学评论》第2期，2007年。

5、工具书

陆文虎编：《〈管锥编〉〈谈艺录〉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美]艾布拉姆斯(Abrams, M.H.)著，吴松江译者：《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日]加藤尚武、久保阳一、幸津国生、高山守、泷口清荣、山口诚一主编，[韩]李信哲译：《黑格尔辞典》，首尔：图书出版b，2009年。

M.H.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Thomson Learning, 1999.

<Abstract>

A Study on Intertext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Qian Zhongshu's *Fortress Besieged*

Han, Jiyeon

Qian Zhongshu (1910–1998) ranks among the foremos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ry scholars and writers, known for his burning wit and formidable erudition. His satiric novel *Fortress Besieged* 围城 seeks to form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by examining a form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lligentsia liv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re-reading of the writings of Qian Zhongshu in order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Qian Zhongshu's thought structures and the unique role Qian played in both the field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cademia.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search how Qian Zhongshu consciously employed such thought in those areas. So as to gain a closer reading of Qian Zhongshu, as Qian's identity was based in literature, I have therefore chosen as my point of departure the novella *Fortress Besieged*, a work that displays different literary forms, from “metaphor” to “allusion”. Here an investigation into how Qian employs such literary forms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both literature and academia using so-called “intertextuality” shall be further discussed and Qian Zhongshu's individual mode of thought shall be demonstrated. A close reading of *Fortress Besieged* allows for many different points of analytical departure, as Qian Zhongshu's work contains many instances of struggle between lively literature and fundamental academic debate. I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that herein lays the value of *Fortress Besieged*.

Key Words : Literature, Scholarship, Metaphor, Allusion, Intertextuality, Literary style

투 고 일 : 2011. 9. 10. / 심 사 일 : 2011. 9. 26. ~ 2011.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10. 20.